

# 二十一世紀評論

## 香港政治

### 後工業年代的香港政治價值

馬嶽

一直以來，對香港政治價值的分析，都是建基於1970至80年代的政治價值意見調查。有關的調查認為香港人重視物質價值，對民主只有片面和工具性的理解，以及港人普遍相信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平等機會和合理性。這些對香港政治文化的理解，主導了香港政制發展的思考。香港回歸前後的管治模式和《基本法》內的政制設計，一直建基於相關的對港人政治價值的假設。

本文綜合了自1980年代起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的「社會指標調查」(Social Indicators Survey)，以及第一波(2001-2003)和第二波(2005-2008)由國立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主持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中，有關政治價值觀的調查數據。廿多年來的調查數據反映，隨着社會發展和香港步入後工業年代，港人對民主的認識有所增加。和東亞其他地區相較，港人對民主價值的支持已經達到一個相對高的水平；對港式的資本主義的主要價值，亦開始抱懷疑態度。這些政治價值的變遷，令回歸後的政經體系的認受性受到挑戰。

一般認為香港人重視物質價值，對民主只有片面和工具性的理解，以及港人普遍相信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平等機會和合理性。這些對香港政治文化的理解，主導了香港政制發展的思考。

#### 一 「片面民主觀」和「開放機會觀」

對香港的政治文化的主流論述，起源於1970至80年代的社會學研究，以及19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民意調查。早年最具影響力的論述，當然是劉兆佳的「功利家庭主義」以及「低度整合的社會政治體系」論<sup>①</sup>。這一論述指出，香港華人重視家庭和物質價值，行有餘力時會致力改善家庭的物質生活環境，而對較理想化的社會性意識形態不大認同，不會把精力投放在改善社會上。劉並認為香港華人面對生活困難時，傾向以家庭或同鄉等網絡解決問題，以致少有政治參與或尋求政府協助。在社會層次，劉認為當年的華人社會組織縱向聯繫薄弱，而且華人社會和殖民地的官僚政府有意識地互不干預(boundary maintenance)，因而帶來低度政治參與和政治穩定的局面<sup>②</sup>。

然而，不少學者並不同意劉兆佳對殖民時代港人政治價值的判斷，或者有關香港社會政治參與程度較低的論述<sup>③</sup>。但無可否認的是，劉有關殖民管治和社會穩定的論述，多年來主導了人們對殖民年代政治的理解。

劉兆佳和關信基在1980至90年代有關香港政治文化的研究，有效地解釋了香港的政治發展狀況：他們建基於民意調查數據，指出港人對民主的理解比較片面，例如不少港人覺得願意聽取民意的政府便是民主政府，而並不視民主為產生政府的過程原則，因而港人可以一方面抽象認同民主原則，但同時又可以接受由公務員執政和精英管治。此外，港人往往偏向以工具性的價值來理解民主，很多人支持民主的主要理由是認為民主可以帶來良好的管治<sup>④</sup>。這個想法的另一面是：如果管治理想（例如回歸前的殖民管治），港人可以接受沒有民主政制。另一方面，劉、關指出港人的政治知識雖然不差，但是政治參與度奇低，是一群「留心的旁觀者」（attentive spectators）<sup>⑤</sup>。劉、關對此的解釋是港人的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偏低，即很多人認為自己的參與不能改變政府政策和政治現實，因而少作政治參與。

港人政治價值的另一個重要部分，是相當相信港式自由資本主義的公平性。多年來，香港的經濟體系都被視為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又譯費利民或弗里德曼）式不干預資本主義的代表，因為殖民年代的香港一直奉行低稅率、低福利的政策，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比亞洲其他新興工業地區為低。這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體系在香港一直有相當認受性。1980年代的民意調查反映，港人很大比例認同如下三點：（1）香港的自由主義經濟體系提供了公平機會；（2）香港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地方；（3）人民應該自力更生而不是靠政府救濟等。這些看法可以概稱為一種對自由資本主義的「開放機會觀」（openness thesis）<sup>⑥</sup>。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的「社會指標調查」<sup>⑦</sup>也反映，1980年代超過八成的被訪者同意香港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地方、個人可以透過努力改變命運，以及認為個人的經濟前景主要由努力和教育決定<sup>⑧</sup>。中產和專業人士對這種「開放機會觀」特別支持和信服，原因應該很簡單：他們正是這個競爭遊戲中的勝利者，因此份外覺得這個遊戲是公平的。劉兆佳與關信基1988年的調查反映有57.5%的被訪者支持政府的不干預政策<sup>⑨</sup>。孔誥烽亦指出，經過中國文化大革命和香港「六七暴動」後，港人的恐共情緒濃厚，令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立起來。對文革的恐懼，令他們對一切與「社會主義」有關的經濟理念和思想（例如福利主義）亦一併全面排斥，因而更為擁抱資本主義的思想和體制<sup>⑩</sup>。

港人政治價值的一個重要部分，是相當相信港式自由資本主義的公平性。多年來，香港的經濟體系都被視為佛利民式不干預資本主義的代表，因為殖民年代的香港一直奉行低稅率、低福利的政策，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比亞洲其他新興工業地區為低。

## 二 政治價值與政經體制設計

「片面民主觀」和「開放機會觀」這兩項政治價值的特質，主導了香港的主流政治論述以至政經體制設計的思維。中央政府在1980年代初期思考香港未來的政經體系藍圖時，或多或少建基於上述的政治價值假設。

在經濟層面，1970年代的「積極不干預」、自由港、低稅率和低福利模式，主導了《基本法》中的經濟思維，以至《基本法》起草委員把很多類似的政策原則，當成憲法原則般寫進《基本法》。《基本法》第五章規定了低稅率、量入為出、不應有赤字預算，某程度上是假定了回歸後的港人一定仍然會接受這種低稅、低福利的社會經濟模式。

在政制層面，為了保障資本家繼續掌握權力，以確保港式自由資本主義可以在1997年後繼續維持，《基本法》的政制設計給予資本家和專業人士額外的代表權。立法會自1997年開始，一半議席由功能界別選出，而功能界別絕大部分的議席都由主要商會、主要經濟產業的企業，以及專業人士團體推舉或選舉產生。在負責選舉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中，工商界和專業團體代表佔至少一半席位。這種由工商界主導的政制設計，假設保護工商界的利益可以確保香港的穩定和繁榮，同時也假定了不少港人可以接受一個偏向工商界、只有部分民選議員的政制設計；由於港人的「片面民主觀」和物質主義傾向，只要回歸後的政府可以提供安定繁榮的生活和良好的管治，非民選的政府仍然可以有相當的認受性。

在負責選舉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中，工商界和專業團體代表佔至少一半席位。這種由工商界主導的政制設計，假設保護工商界的利益可以確保香港的穩定和繁榮，同時假定不少港人可以接受一個偏向工商界、只有部分民選議員的政制設計。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所有議席最終都會由普選產生，但並沒有訂下確切的時間表。《基本法》承諾的，其實只是一個抽象的終極民主目標、一個部分民選的議會，以及將會「循序漸進」地走向普選的目標。關信基和劉兆佳指出，由於港人對民主的理解只為片面 (partial)，因而容易妥協接受「循序漸進」的局部改革；只要政府管治令人滿意，爭取民主的動力便會減弱<sup>⑩</sup>。香港《基本法》規定的「半吊子式民主」，正符合這種「片面民主觀」，因為如果港人並不理解「民主」為產生政府的程序，或者是政治上的平等權利，而認為「民主」只是代表民意有表達的渠道，以及政府會尊重民意，那麼非經民選的政府也有可能給予足夠的政治財 (political goods) 來維繫其認受性，而部分民選的議會也足以宣洩和反映民意。

1980年代中央政府制訂有關香港未來的政經藍圖時，對港人政治文化的假設正是港人可以接受一個由公務員決策及掌握主要權力的非民選政府，因而不需要為港人提供很多參政及影響政治的渠道，原因是港人並沒有很強的參與訴求。只要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可以提供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並非民主產生的政府也可獲得相當的正當性 (performance legitimacy) ——殖民政府不就是從來沒有民主，但仍然為港人認受嗎？

### 三 二十年來的價值變遷

上述的分析框架和方向有一個重要假設：即港人的政治價值是可以持久不變的，1970至80年代的政治文化和價值可以在回歸後仍然維持，以至成為特區

管治的合法性基礎；與此同時，上世紀殖民年代的某些政經模式特質，港人在回歸後會繼續接受。但自1980年代開始，二十多年來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變化，令港人的政治意識、對民主的觀念，以至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看法，都出現相當的變化。

在政治的層面，港人對民主的觀念，廿多年來無疑出現相當的變化。前述劉兆佳的「功利家庭主義」分析，某程度上建基於香港是「難民社會」的假設，認為香港華人的生存需要壓倒一切，因而對民主只能有工具性的理解。這套論述忽略了自1970年代開始香港本土意識的發軔。土生土長的港人自1960至70年代後「以香港為家」的意識漸強，願意為改善香港的社會狀況努力，「難民社會」的解釋慢慢失效。隨着土生土長的港人的比例愈來愈高，以及社會生活質素提升，「功利家庭主義」是否適用於香港大成疑問。1980年代香港前途談判帶來的政治化、自1980年代興起的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培養的參與意識、「八九民運」和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政改方案帶來的政制爭論，都令1980年代後成長的港人在充滿政治爭論的環境之中長大，與戰後早年去政治化的政治環境很不相同。

從宏觀的社會經濟發展着眼，隨着香港經濟起飛，年輕一代教育水平提高，公民意識和參與意識隨之提高。關信基和劉兆佳在1993至94年間就中、港、台的政治文化的比較調查便已反映，港人的政治態度比中國大陸和台灣更「現代化」，包括最少人認為政府應扮演「道德政府」(moral state)的角色<sup>⑫</sup>、最少人接受傳統的家長式價值(例如認為人民應像遵從家長般遵從政府)，以及最少人覺得國家利益應凌駕個人之上<sup>⑬</sup>。這項比較調查反映現代化過程可以改變華人文化中的傳統政治價值，而香港在經過多年的快速現代化後，傳統的華人保守政治價值已所剩無幾，遂成為中、港、台三地中，政治價值最接近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價值的地方，但由於民主制度發展緩慢，香港在政治參與的程度上落後於台灣<sup>⑭</sup>。

2003年7月1日的五十萬人遊行，無疑是港人政治參與意識的分水嶺。五十萬人上街反對國家安全立法及抗議特區施政不善，迫使特區政府撤回國家安全立法，並且將民主普選的議題提上前台，更間接導致特首董建華其後下台。對很多新一代港人來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充權(empowerment，又譯「賦權」)經驗<sup>⑮</sup>。由國立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主持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sup>⑯</sup>的第一波(2001)和第二波調查(2007)反映，港人的政治效能感在數年間有相當上升。第一波調查中，只有1.6%的被訪者表示自己對政治「非常有興趣」，16.0%表示「有興趣」；在第二波調查中，有2.9%的被訪者表示「非常有興趣」，21.1%表示「有興趣」。換言之，表示「非常有興趣」和「有興趣」的被訪者，在六年間上升了6.4%。第一波調查中，只有3.9%的被訪者表示「非常同意」或「同意」「我相信我有能力參與政治」，至第二波調查時則上升至10.4%。這數字比起東亞不少地區的兩成多

劉兆佳的「功利家庭主義」分析，某程度上建基於香港是「難民社會」的假設。然而這套論述忽略了香港本土意識的發軔。土生土長的港人自1960至70年代後「以香港為家」的意識漸強，願意為改善香港的社會狀況努力，「難民社會」的解釋慢慢失效。

或三成的同意比例，港人的政治效能感仍然是偏低，但一個日漸活躍的、熱衷參與政治的群體已在長成。

#### 四 趨向平等權利：不再片面的民主觀

除了政治效能感提升外，港人對民主觀念的理解亦出現了質變。前述「片面民主觀」的論述認為港人的主流價值偏向工具性，對民主政制的核心價值了解不足。1980年代香港民主運動的主調是「民主抗共」，民主派團體推動民主政制的主要理據，是民主政制有助捍衛回歸後香港的人權、法治、自由和基本生活方式，是抵抗內地的政治力量干預香港的最有效方法，因此出發點其實是工具性的。

回歸後，民主派議員和團體推動民主運動的基本論述，逐漸從「民主抗共」，轉為「民主可以改善施政」、「普選令政府聆聽民意」、「民主帶來公平的遊戲規則」等工具性論述，將政制缺乏民主和施政不善及經濟困境連結起來，然後再轉到「民主普選是基本權利」此一本質式的論述。

隨着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提高、1990年代後民主化風潮席捲全球、西方的民主、人權思想逐漸變成普世價值，港人對人權和民主等價值的支持也愈來愈高。回歸後，民主派議員和團體推動民主運動的基本論述，逐漸從「民主抗共」，轉為「民主可以改善施政」、「普選令政府聆聽民意」、「民主帶來公平的遊戲規則」、「民主可令基層的意見獲重視」等工具性論述，將政制缺乏民主和施政不善及經濟困境連結起來，然後再轉到「民主普選是基本權利」此一本質式的論述。

2003年「七一遊行」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面普選的議題提上政治議程。民主派議員經常在議事堂中，反覆詰問官員現行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和功能界別選舉制度，賦予了工商界和專業人士更多的投票權利，如何能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中，有關選舉權必須是平等和普及的規定。這對特區政府構成莫大的政治壓力和認受性問題，因為他們很難說服港人，香港自稱是自由城市，人民卻不能享有最根本的政治平等權利，以及透過普及而平等的選舉選出他們的政府首長和立法會議席。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二波調查的數據反映，港人在民主價值的認同方面，不弱於很多其他東亞民主地區，比起1980年代的「片面民主觀」已經有很大的進步。簡單而言，我們可就港人以下三類有關政治價值的問題的回應數據作出分析，包括：(1) 對專制選項 (authoritarian alternatives) 的支持 (例如軍人統治、強人統治、一黨獨大等)；(2) 對家長式價值 (paternalism，又譯「父愛主義」) 的支持；(3) 對社會和政治平等和多元性的支持。

從表1可見，就各項專制選項的支持分析，在第二波調查中，香港只有4.5%的被訪者贊成「應該由軍隊來統治香港」。在東亞地區中，菲律賓、印尼、越南、泰國等國支持軍人統治的比例最高，由兩成到三成不等，香港的支持比例與日本、南韓和新加坡等較發達地區相若，都是區域中最低者。

表1 東亞地區對專制選項和家長式價值的支持(比較數字)，2005至2008年

問句：應該由軍隊來統治香港											
國家或地區	台灣	蒙古	菲律賓	泰國	南韓	新加坡	印尼	越南	日本	馬來西亞	香港
贊成比例(%)	6.2	11.7	24.4	19.7	4.7	4.2	29.7	24.0	4.3	9.7	4.5
問句：應該廢除立法會與選舉，由一個強而有力的領袖決定一切											
國家或地區	台灣	蒙古	菲律賓	泰國	南韓	新加坡	印尼	越南	日本	馬來西亞	香港
贊成比例(%)	16.8	60.9	38.5	21.8	12.0	9.5	9.8	11.7	15.0	32.7	10.9
問句：應該只允許一個政黨參選和執政											
國家或地區	台灣	蒙古	菲律賓	泰國	南韓	新加坡	印尼	越南	日本	馬來西亞	香港
贊成比例(%)	20.2	27.0	33.1	17.7	7.1	7.5	8.2	55.1	9.6	19.4	6.6
問句：政府和人民的關係，應該跟父母和子女的關係一樣											
國家或地區	台灣	蒙古	菲律賓	泰國	南韓	新加坡	印尼	越南	日本	馬來西亞	香港
贊成比例(%)	24.6	71.4	56.0	54.2	36.4	56.5	73.7	73.7	23.9	63.0	29.2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2005至2008年。

香港只有約11%的被訪者贊成「廢除立法會與選舉，由一個強而有力的領袖決定一切」，比例同樣是區內最低之一，其支持比例比區內部分半民主國家如泰國(21.8%)、馬來西亞(32.7%)、菲律賓(38.5%)、蒙古(60.9%)都低得多，甚至低於台灣(16.8%)。

另外，香港只有6.6%的被訪者同意「應該只允許一個政黨參選和執政」，是整個東亞十一個地區中比例最低的，對政治多元的支持甚至高於成熟的民主國家如日本等。

在家長式價值方面，香港只有29.2%的被訪者認同「政府首長就像一個大家庭的家長，一切大小公共事務，都應該聽從他的決定」，在整個東亞地區中只有台灣和日本的比例比香港更低，這顯示港人對家長式價值的支持，在整個東亞地區已算甚低。

上述的調查數據反映，比較其他東亞社會的政治價值，2007年港人對各項專制選項和家長式價值的支持已經甚低，和區內部分成熟民主社會的水平相若。如果很多東亞地區都可以成功推行民主政制，那麼港人對民主的支持亦應足夠令民主政制健康運作。

另一方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反映港人對政治平等和社會多元等價值亦相當支持，部分數據和區內的穩定民主政體相若。從表2可見，在第二波調查中，80.6%的被訪者同意「沒有怎麼受過教育的人，應該跟教育程度高的人一樣，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發言權」。這支持平等權利的比例，在東亞地區可說是中等，低於日本、南韓、馬來西亞、越南、台灣的比例，與印尼的相若，但高於新加坡、泰國，以及遠高於蒙古和菲律賓的比例。

在社會和政治多元性方面，香港有36.8%的被訪者贊成「政府應該有權決定甚麼意見可以在社會上流傳」。這比例在整個東亞只比日本和台灣為高，與南韓

港人對民主的理解，在某些層面已經和運作有效的民主政體(如日本、南韓等)相若。當港人對民主的理解愈來愈全面，《基本法》規定的部分民選的體制和回歸後極為緩慢的民主進程，難免持續地受到民間運動的挑戰。

表2 東亞地區對政治平等和社會多元的支持(比較數字)，2005至2008年

問句：沒有怎麼受過教育的人，應該跟教育程度高的人一樣， 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發言權											
國家或地區	台灣	蒙古	菲律賓	泰國	南韓	新加坡	印尼	越南	日本	馬來西亞	香港
贊成比例 (%)	96.3	55.1	60.1	75.5	97.1	70.7	79.4	87.3	88.7	85.1	80.6
問句：政府應該有權決定甚麼意見可以在社會上流傳											
國家或地區	台灣	蒙古	菲律賓	泰國	南韓	新加坡	印尼	越南	日本	馬來西亞	香港
贊成比例 (%)	21.2	82.2	66.7	42.0	35.5	71.0	45.7	72.9	17.1	70.2	36.8
問句：如果有很多不同的團體，會影響安定與和諧											
國家或地區	台灣	蒙古	菲律賓	泰國	南韓	新加坡	印尼	越南	日本	馬來西亞	香港
贊成比例 (%)	57.4	81.8	57.5	82.0	35.4	49.3	41.9	39.6	40.8	69.1	47.9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2005至2008年。

的相若，而低於差不多所有調查中的其他東亞地區，反映整個東亞地區中，日本和台灣比香港更尊重意見的多元性。

同時，有47.9%的被訪者同意「如果有很多不同的團體，會影響安定與和諧」，比例低於馬來西亞、泰國、蒙古、台灣和菲律賓，與新加坡相若，而高於日本、南韓、越南和印尼，反映港人對社會多元的支持，在東亞地區可說是處於中上位置。

上述的調查結果反映，到了2007年，港人對民主價值的認同，在東亞地區來說已達到頗高水平，部分指標與發展水平較高的民主政體如日本、台灣、南韓等相若，居於中上位置，但整體而言，港人對民主價值的認同，已經高於區內不少已實行民主普選的地區。這和傳統的「片面民主觀」的論述，無疑有相當距離。港人對民主的理解，在某些層面已經和運作有效的民主政體(如日本、南韓等)相若。當港人對民主的理解愈來愈全面，《基本法》規定的部分民選的體制和回歸後極為緩慢的民主進程，難免持續地受到民間運動的挑戰。

## 五 經濟轉型和價值變遷

《基本法》中建構的政經體系，透過保證工商界在政治上的主導地位，來確保香港繼續奉行低稅率、低福利的經濟體制。在香港工業起飛年代，很多人相信經濟開放自由的香港是充滿機會和公平的，會獎賞聰明和勤勞的人，只要自力更生、勤勞工作便可以改善生活，政府不應亦不需提供太多福利，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體系有相當的認受性。但當香港步入後工業年代，經濟轉型帶來的各種經濟和社會變化，開始令政治價值出現變遷。

香港自1980年代開始踏入快速經濟轉型，大量工廠北移至內地，製造業迅速萎縮，第二產業的勞動人口從1970年代的超過一半，急速下降至2005年的不

在香港工業起飛年代，很多人相信經濟開放自由的香港是充滿機會和公平的，會獎賞聰明和勤勞的人，只要自力更生、勤勞工作便可以改善生活，政府不應亦不需提供太多福利，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體系有相當的認受性。

足一成。香港再度變為中國的轉口港以及由服務業主導的亞洲國際金融中心。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風暴對低教育水平和低技術工人形成最大打擊。在全球化和香港加快市場化的衝擊下，公營機構僱員、商業機構和服務專業行業都精簡架構，各行各業面對外判、私有化和工作崗位零散化的風潮。失業率自1997年的低點（僅超2%）攀升至2003年最高點（約8%），各階層的工作穩定性大受影響，貧富懸殊加劇，而不少中產階級亦蒙受失業、減薪及物業淪為負資產之苦。中產階層一直相信努力讀書和改善個人競爭條件便可安居樂業的想法，至此大受挑戰<sup>⑦</sup>。

經濟環境的轉變令港人對自由市場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社會流動的前景，以及個人努力能否改善生活，都開始產生質疑。鄭宏泰和黃紹倫根據中大亞太研究所的「社會指標調查」，指出1997年是港人對社會流動的印象的分水嶺；對個人經濟前景表示悲觀的人增加，而認為下一代的經濟環境會改善的人則減少<sup>⑧</sup>。1988和1990年的「社會指標調查」都反映，達63%的被訪者相信他們的家庭在三年後生活會有所改善，但到了2001、2004和2006年，大約只得30%的被訪者認為未來三年生活會有所改善<sup>⑨</sup>，反映港人對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下可帶來的社會流動，信心已大為減弱。

在這情況下，港式資本主義的公平性開始備受質疑，而港人對大財團在政治和經濟上主導的不滿亦增加。1988年的「社會指標調查」中，有多達58%的被訪者支持政府的放任經濟政策，至1999年的調查顯示，此比例已下降至45%，而有23%的被訪者反對「積極不干預主義」<sup>⑩</sup>。在1999年的「社會指標調查」中，67%的被訪者認為香港的資本主義體系有公平的競爭，比1980年代的數字下降了20%<sup>⑪</sup>。1997年的「社會指標調查」中，已經有52%的被訪者認為商界的影響力過大，到了2006年，44%的被訪者認為商界領袖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力「非常大」、22%認為「大」、只有大約5%會以「小」或「很小」來形容商界的影響力，而有59%的被訪者認為商界領袖影響力過大，並且有多達82.4%的被訪者認為政商之間存在利益輸送的情況，44%的被訪者認為此問題「嚴重」或「非常嚴重」。鄭宏泰和黃紹倫指出，自1990年代後，港人對商界領袖日趨不信任。到了2006年，已經有約四成的被訪者不同意「讓商界領袖盡量賺錢對大家都有好處」<sup>⑫</sup>。

上述的分析和研究數據反映，香港在1960至70年代經濟快速起飛，社會流動快，戰後成長的「第二代」港人不少受惠於1980年代開始的移民潮和本地化浪潮，可以在社會階梯中迅速爬升，令整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體系可以有很高的認受性，因為不少人的生活經驗顯示，的確可以透過努力改善生活環境，令他們覺得港式資本主義機會處處而且機會平等，對商界在政治上的主導位置亦沒有很大不滿。但隨着香港步入後工業時期，經濟增長減慢，全球化下的競爭令社會流動比前困難，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而不同產業均開始受大企業壟斷所影響，港人對自由市場下的平等機會遂開始懷疑。當工商界的政治主導地位未能帶來持續的經濟繁榮和生活改善，整個政經體系的正當性亦備受質疑。港人開始將經濟上的不公平，連繫到政治權力和權利不平等上，由此對整個體制的認受性帶來衝擊。

隨着香港步入後工業時期，經濟增長減慢，社會流動比前困難，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而不同產業均開始受大企業壟斷所影響，港人對自由市場下的平等機會遂開始懷疑，並將經濟上的不公平連繫到政治權力和權利不平等上，由此對整個體制的認受性帶來衝擊。



## 六 結語：邁向後工業年代的政治價值

自2008年開始，特區政府的民意支持度持續處於低位，但弔詭的是：一般經濟指標上，香港自2008年以來的表現並不算差。在2011年中，香港的失業率跌至3.4%，是十三年來（即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最低，而經濟增長率亦在2009年中後回復正增長，但特區政府民望自2008年中後一直居於低位，並沒有隨着經濟復甦而反彈的跡象。政府近兩年並且面對更多激烈的社會行動衝擊，逐漸陷入認受性危機之中。

這現象反映了過去對港人的政治價值的假設，到今天已經站不住腳：單靠經濟增長並不足以維繫政經體系的認受性。簡單地說，舊有的研究對港人政治價值的分析，建基於難民社會年代和工業社會年代的香港，對物質價值比較重視、對社會流動和自由經濟體系下的平等機會較有信心，以及對民主的政治價值抱不完全或工具性的理解。廿多年後，香港已經踏入後工業年代。正如恩高克 (Ronald Inglehart) 和韋素 (Christian Welzel) 指出，持續的經濟發展會改變人民的價值，從重視與生存有關的物質價值，轉變為更重視與生活質素有關的後物質主義價值 (post-materialist values)，以及人民亦會更認同現代開明社會所主張的包容、平等和自由等自我表達的價值 (self-expression values) ⑳。隨着香港從工業社會快速轉型及邁進後工業社會，社會和經濟起碼發生了三方面的變化，令港人的政治價值出現根本的變化。

首先，隨着年青一代在較富裕的環境中成長，物質價值的整體重要性下降。2004年反對填海運動、2006年保衛天星碼頭及2007年保衛皇后碼頭運動、2009年「反高鐵」等運動，都反映環保和保育等後物質主義的價值在社會中已得到愈來愈多人的共鳴，在新一代的社會運動中佔重要位置㉑。但特區政府仍然強調「發展主義」和以經濟增長為最高綱領的管治意識形態，與日漸走向「後物質主義」的政治價值無疑是格格不入的。政府以經濟發展為最高目標的政策哲學和決策原則，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第二，社會經濟發展和全球化的影響，令港人更容易認同西方社會視為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平等權利。廿多年的民主運動和民主教育、教育水平和民主意識的提升，都令港人對民主價值的認識和認同，在東亞地區內處於高水平。當港人更多理解民主應包括平等政治權利、是全民投票產生政府的過程，以及是基本權利的體現時，單用經濟表現或施政表現，已很難維繫整個政經體系的認受性。

第三，港人質疑社會分配不公平。當香港進入後工業社會，一般後工業社會出現的社會經濟變遷亦一併出現：經濟增長減慢、貧富差距擴大、教育水平不高的一群找尋工作日益困難、金融資本的壟斷影響中小企業的生計，以及不同行業都面臨全球化的競爭。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少有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但仍然不能避免社會和階級矛盾的加劇。香港的低稅、低福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在回歸前因為快速的經濟增長和社會流動，贏取了相當的認

特區政府民望自2008年中後一直居於低位，沒有隨着經濟復甦而反彈。政府近兩年並且面對更多激烈的社會行動衝擊，逐漸陷入認受性危機之中。這現象反映了過去對港人的政治價值的假設，到今天已經站不住腳：單靠經濟增長並不足以維繫政經體系的認受性。

受性，但步入後工業社會後，「開放機會觀」逐漸不符合社會現實，港人因此開始質疑社會分配的不公和政府低度干預的體制是否合理，從而開始懷疑商界領袖在政治上的主導地位，是造成上述種種社會矛盾的元兇。特區整個政經體系的認受性，因而面臨嚴重挑戰。

特區政府的管治困難來源之一，在於整個制度設計停留在三十年前對港人的政治價值的假設。當政治價值快速改變，而特區政府的政制改革極為緩慢，經濟管理和社會政策的哲學仍然沿用「大市場、小政府」等新自由主義的原則時，特區的施政已經很難回應港人訴求，必然會帶來持續的民間挑戰與管治危機。踏入回歸十五年，如何回應港人已轉變的政治價值，必然是未來特區領導重要的思考課題。

特區政府的管治困難來源之一，在於整個制度設計停留在三十年前對港人的政治價值的假設。當政治價值快速改變，而特區政府的政制改革極為緩慢，經濟管理和社會政策的哲學仍然沿用「大市場、小政府」等新自由主義的原則時，特區的施政已經很難回應港人訴求。

### 註釋

①② Lau Siu-kai,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2), 72-85; 157-82.

③ 例如林蔚文並不同意殖民地初年政治冷感或低度政治參與的論述，黃偉邦和呂大樂亦質疑香港華人是否倚賴家庭網絡來解決生活問題，其他學者亦有質疑當年的華人社會和殖民政府是否互不干預。參見Lam Wai-man,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Hong Kong: The Paradox of Activism and Depoliticiz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4); Thomas W. P. Wong and Lui Tai-lok, "From One Brand of Politics to One Brand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Hong Kong*, ed. Lau Siu-kai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09-54; Stephen W. K. Chiu and Hung Ho-fung, "State Building and Rural Stability", in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ed. Ngo Tak-w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74-100。

④⑩ Kuan Hsin-chi and Lau Siu-kai, "The Partial Vision of Democracy in Hong Kong: A Survey of Popular Opin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July 1995): 239-64.

⑤ 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The Attentive Spectato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4, issue 1 (1995): 3-24.

⑥ Thomas W. P. Wong,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Ideology: Thematization and Theorization in Social Indicators Studies", in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0*, ed. Lau Siu-kai et al.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2), 211.

⑦ 「社會指標調查」是自1988年起進行的有系統、兩年一度的社會調查，就港人對社會生活的各種價值觀和主觀感覺，搜集調查數據，以分析香港的社會變遷。

⑧ Thomas W. P. Wong, "Inequality,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88*, ed. Lau Siu-kai et al.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161; 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63-65.

⑨ 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Public Attitude toward Laissez Faire in Hong Kong", *Asian Survey* 30, no. 8 (1990): 767-81.

- ⑩ 孔誥烽：〈論說六七：恐左意識底下的香港本土主義、中國民族主義與左翼思潮〉，載羅永生編：《誰的城市？：戰後香港的公民文化與政治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1997），頁89-112。
- ⑪ 具體而言，在調查中有關「道德政府」的界定，包括政治領袖應該具有崇高的道德水平、政府需為社會的道德水平和個人的道德水平負責等。關、劉的研究假設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有相當的「道德政府」成份，而有關的價值跟現代西方的民主價值背道而馳。香港在幾項問題中，對「道德政府」的支持比例都遠低於台灣和中國大陸，反映香港的政治文化與傳統文化相距最遠。參見Kuan Hsin-chi and Lau Siu-kai, "Traditional Orienta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ree Chinese Societ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1, no. 31 (2002): 304。
- ⑫⑬ Kuan Hsin-chi and Lau Siu-kai, "Traditional Orienta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ree Chinese Societies", 304-305.
- ⑭ Francis L. F. Lee and Joseph M. Chan, "Making Sense of Participati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Pro-democracy Demonstrators in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93 (March 2008): 84-101.
- ⑮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前身為「東亞民主動態調查」[East Asia Barometer]) 為一大規模的跨國研究，以民意調查方法用同一核心問卷訪問亞洲不同地區人民的政治態度，在2001至2003年及2005至2008年分別進行兩波調查，覆蓋東亞及南亞十多個地區共二十億人口。有關香港的兩波調查分別在2001及2007年完成。
- ⑯ 呂大樂、王志鏗：《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香港：三聯書店，2003），頁120。
- ⑰ Victor Zheng and Wong Siu-lun, "Class, Mobilit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Hong Kong before and after 1997", in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Its First Decade*, ed. Joseph Y. S. Cheng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7), 495-533.
- ⑱ Victor Zheng and Wong Siu-lun, "Social Trends: A Comparison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dicators", in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6*, ed. Leung Sai-wing, Wan Po-san, and Wong Siu-lun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8), 272.
- ⑲ 參見Lau Siu-kai, "Confidence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in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9*, ed. Lau Siu-kai, Wan Po-san, and Wong Siu-lun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101。
- ⑳ Lau Siu-kai, "Confidence in Hong Kong's Capitalist Societ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sian Financial Turmoi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2, no. 35 (2003): 373-86.
- ㉑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市民「疑商厭商」的心態〉，載黃紹倫、尹寶珊、梁世榮編：《新世紀華人社會面貌：社會指標的分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08），頁291-318。
- ㉒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㉓ Alvin So, "Social Conflict in Hong Kong after 1997: The Emergence of a Post-modern Mode of Social Movements?", in *China's Hong Kong Transformed: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 beyond the First Decade*, ed. Ming K. Chan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8), 233-51.